

论浙江籍状元的时空分布特征

项顺贵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旅行社管理系, 浙江 杭州 311231)

摘要:历史上浙江籍状元在时间上的分布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向少数地区集中的特点。这一分布特征同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教育文化水平等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浙江; 状元; 分布; 背景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2)04-0081-05

自隋至清,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国存在了近1300年,是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风貌的重要人文基础。士人想取得进士功名甚至高中状元,除必须具有浓厚的经学、文学功底,对国政、治民方略具有相当见解之外,其所处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特别是教育基础,也是其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通过对浙江历代状元时空分布规律的分析,来探讨这一极具特色的人文地理理论题在浙江区域内的体现。

为论述方便,本文所指的浙江及各地市,以当前行政区划为准,所指“状元”,则指进士殿试第一名,研究的时段始于唐、迄于清,不包括隋朝(因资料缺失)。而唐至清的朝代又以相对统一的王朝作为基本的分析对象,因为分裂时期众多地方及割据政权所举行的科举考试,应试者多来自各割据政权所辖领地,籍贯的地域特色十分明显,因此本文不将其纳入分析对象。

一、浙江籍状元的时空分布特征

据文献记载中国历史上共产生各类状元约800名,明确著录籍贯的浙江籍进士殿试状元有75名(不包括武举、明经诸科及特奏等形式产生的状元)。按中状元时间的先后顺序,这75名浙江籍状元分别为(括号内为籍贯和中状元年代):贺知章(绍兴,695),沈亚之(湖州,815),施肩吾(杭州,820),程宿(衢州,988),周启

明(丽水,1000年前后),齐唐(绍兴,1023),陈舜俞(湖州,1059),贾安宅(湖州,1100),莫俦(湖州,1112),何涣(金华,1121),沈晦(杭州,1124),张九成(杭州人,1132),刘章(衢州,1145),王佐(绍兴,1148),王十朋(温州,1157),木待问(温州,1163),蔡幼学(温州,1172),詹骀(杭州,1175),徐邦宪(金华,1177),姚颖(宁波,1178),陈亮(金华,1193),莫子纯(宁波,1196),傅行简(宁波,1202),赵建大(温州,1211),袁甫(宁波,1214),王会龙(台州,1226),周坦(温州,1238),徐俨夫(温州,1241),留梦炎(衢州,1244),方逢辰(杭州,1250),姚勉(绍兴,1253),方山京(宁波,1262),王龙泽(金华,1274),朱继志(金华,1354),张信(舟山,1394),周旋(宁波,1437),商辂(杭州,1445),谢迁(宁波,1474),王华(宁波,1481),李旻(杭州,1484),邵锐(杭州,1506),姚涑(宁波,1523),韩应龙(宁波,1535),茅瓚(杭州,1538),秦鸣雷(台州,1544),唐汝楫(金华,1550),诸大绶(绍兴,1556),范应期(湖州,1565),罗万化(绍兴,1568),张元汴(绍兴,1571),朱国祚(嘉兴,1583),杨守勤(宁波,1603),韩敬(湖州,1610),钱士升(嘉兴,1616),余煌(绍兴,1625),史大成(宁波,1655),严我斯(湖州,1664),蔡启傅(湖州,1670),蔡升元(湖州,

收稿日期:2011-12-06

作者简介:项顺贵(1972-),男,安徽安庆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浙江地方文化。E-mail: xsg@tczj.net

1682), 沈廷文(嘉兴, 1688), 周澍(杭州, 1730), 金德瑛(杭州, 1736), 金甦(杭州, 1742), 梁国治(绍兴, 1748), 吴鸿(杭州, 1751), 蔡以台(嘉兴, 1757), 汪如洋(嘉兴, 1780), 茹棻(绍兴, 1784), 史致光(绍兴, 1787), 王以銜(湖州, 1795), 姚文田(湖州, 1799), 朱昌颐(嘉兴, 1826), 钮福保(湖州, 1838), 章鋈(宁波, 1852), 钟骏声(杭州, 1860)。

归纳起来, 浙江籍状元的分布特征见表 1:

表 1 浙江籍状元的时间分布

朝代	唐	北宋	南宋	元	明	清	合计
状元	3	8	22	1	21	20	75

这 75 名浙江籍状元的地理分布与时空变化呈现以下主要特征:

(1) 自唐至清, 浙江籍状元的出现呈现明显增多的趋势。唐朝时, 以进士科出身的浙江籍状元只有 3 名, 至北宋时已增至 8 名, 南宋由于以浙江为中心偏安东南一隅, 浙江经济、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加之杭州为国都等特殊原因, 浙江籍状元数达到了空前的 22 名。元代因特殊的政治和科举环境, 浙江籍状元仅出一名。明、清两代, 浙江籍状元数分别达 21、20 名, 排在同期各省所出状元总额的第一和第二位。浙江历代所出状元中, 南宋、明、清三代共有 63 名, 占历代浙江籍状元总数的 84%。

中国历史上的状元籍贯分布在地理上呈现自北向南逐渐推移的趋势, 浙江属于南方, 其状元在时间上的分布特点与这一趋势基本吻合。唐宋时期著录籍贯的状元总数为 112 名, 其中出自北方的有 68 名, 占全国状元总额的比率超过 60%, 出自南方的状元 44 名, 不到总额的 40%; 其后, 南方籍贯的状元数额渐渐取得了绝对的优势, 元明清时期著录籍贯的状元总数为 194 名, 出自北方的仅有 26 名, 占总额的 14% 不到, 出自南方的状元达 168 名, 超过总额的 86%。^[1]

(2) 浙江历代状元的分布, 明显呈现向少数地区集中的状况(见表 2)。杭州、绍兴、湖州、宁波等四个地区共出状元 50 名, 占全部 75

名浙江籍状元总数的 2/3, 其中杭州地区最多, 有 14 名, 宁波次之, 有 13 名, 湖州 12 名, 绍兴 11 名。除上述四地, 另外七个地区共出状元 25 名, 仅占总数的 1/3, 嘉兴、金华、温州各有 6 名, 衢州 3 名, 台州 2 名, 浙西南山区及舟山海岛等地尤少, 舟山、丽水地区历史上仅各出状元 1 名。

二、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浙江籍状元分布的时间特征

影响状元时空分布的因素很多, 首要因素是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 即分布的变化趋势与其经济发展的进程吻合。自唐至清, 浙江籍状元人数的明显增多与唐宋后中国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向江南地区转移, 文化重心与人才密集区也相应变动的背景密切相关。

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东迁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自东汉末期始, 北方长期遭受战乱的破坏, 而南方相对保持安定, 战乱既严重破坏了北方的经济, 也造成人口大量南迁, 移民给南方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并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 促进南方经济的迅猛发展。北方过度倚重农业, 千百年的滥垦滥伐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 导致各类自然灾害不断, 农业衰颓, 而南方自然条件相对优越, 更适合农业发展, 同时, 农工商并举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两宋时, 无论是从农业的总产量或单位面积产量, 手工业、商业、贸易的繁荣程度, 以及人口的总数及密度等方面判断, 全国的经济重心都已完成了从北方向江南地区的转移。

“六朝”之前, 浙江地区基本上处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状态, 政治地位低下,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六朝”时, 由于北方的长期战乱造成中原及江淮间大量流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南渡, 这给浙江地区带来了加速发展的机遇。至隋唐, 随着运河的开凿、水利的兴修和人口的持续增加, 浙江境内, 尤其是杭嘉湖和宁绍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虽然经济中心逐渐南移, 但隋唐时的北方仍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南方知识分子并没有得到统治者足够的信任, 这或多

表 2 浙江籍状元的地区分布

地区	杭州	宁波	湖州	绍兴	嘉兴	金华	温州	台州	衢州	丽水	舟山	合计
数额	14	13	12	11	6	6	6	2	3	1	1	75

或少影响到了南北状元的数额。唐代明确著录籍贯的状元数计有 115 名，其中北方有 83 名，约占 72%，南方 32 名，仅占 28%，其中，浙江仅出山阴籍（绍兴）贺知章、吴兴籍（湖州）沈亚之和富阳籍（杭州）施肩吾等三人。

五代时期，吴越国“保境安民”的国策使得浙江保持了近八十年相对稳定的局面，社会文化水平也逐渐赶上北方。

北宋时的浙江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漕都下米石五十万石，其他财赋供馈不可悉数”，“国家根本，仰给东南”，^{[2]8634}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也从中原地区逐渐向江南地区转移，至“靖康之变”后彻底完成。与此趋势相适应，南北状元的数额亦发生了逆转，北宋时明确著录籍贯的状元共 69 名，其中北方籍 29 名，占 42%，南方籍 40 名，占 58%。但北宋初期，“东南，天地之奥藏，宽柔而卑；西北，天地之劲方，雄尊而严”的传统观念仍然没有改变，赵宋皇族与主要大臣皆出身北方，政治上对南方知识分子仍不能给以足够的信任，出身陕西籍的寇准认为“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甚至在状元人选的最后确定时竭力主张将南方籍肖贯中更易为山东平度人蔡齐，并为此而逢人便夸口：“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3]宋仁宗（1023—1063 年在位）前，北方籍状元有 20 名，南方籍则只有 9 名。面对南方经济不断发展、人才集团不断涌现的现实，朝廷再不能轻视南方知识分子的作用，南方籍士人被选为状元的人数也迅速增加，自仁宗开始至北宋末，北方籍状元就只有 9 名，而南方籍状元则达 31 名。浙江籍状元数在北宋时期也增至 8 名，大多仍分布在浙北及浙东，共有 5 名。

随着南宋定都杭州，浙江成为宋朝的政治中心，这进一步稳固了江南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苏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等谚语即是这一状况的写照，浙江也始获“文物之邦”的美誉。加之政治上偏安一隅的原因，南宋著录籍贯的 49 名状元中，南方籍竟有 47 名，几尽全数，其中浙江籍又有 22 人，占总数的近 45%，数额空前。地域的分布也较广，除嘉兴、湖州、丽水及舟山外，浙江其余各地皆有分布。

元代科举不仅时间短、取士少、规模小，且

对蒙古、色目人实行倾斜政策，因此汉族士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十分困难，被迫放弃学业者甚多。浙江籍状元也仅出朱继志一名。

明清时期，浙江仍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且明初开始，区域性的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杭嘉湖、宁绍等平原地区，桑、麻、棉、茶等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经济作物取代粮食作物被大量种植和商品经济发展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前者既是后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后者的进一步发展。传统中国社会，以耕求温饱，以读求发达，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明清之际的浙江除了传统的“书香门弟”外，还出现了众多的工场主、商人、绅土地主、富足的自耕农、医生、教师等阶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具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其结果必然是造就众多的士人奔向科举之路。明代，浙江籍进士数、状元数均列全国第一，清代则皆列全国第二。

三、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与浙江籍状元分布的空间特征

浙江籍状元的分布主要由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在时间分布上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而在空间分布上，则由于省域内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向少数地区集中的情形，正如清人在论述浙江科举时所谓：“每科中式，惟杭、嘉、湖、宁、绍最多”。^{[4]13}杭州（主要指其平原地区）、湖州、嘉兴、绍兴、宁波五地都位于水网密布的平原地带，农业发达，加之古代以水运为主，故交通也最为便利。“仓禀实而知礼节”，五地历史上所出进士数额都列浙江各地前列，而所出状元则占全省总数的四分之三，科业如此发达，与其地经济发展所奠定的物质基础关系密切。

秦汉时期，浙江孤处东南，远离政治中心，加上人口稀少，交通闭塞，因此经济十分落后。随着政治地理的开拓，浙江在全国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经济也随之发展。“六朝”前期，随着内河航运的发展和海外交往的活跃，处于水网枢纽和沿海地带的杭嘉湖、宁绍地区经济发展相较于其他地区而言，较为迅速。随后北方的长期战乱，尤其是“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造成北方人民大量南迁，移民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就浙江而言，移民主要迁入

的地区是杭嘉湖和宁绍平原地区;大量水利工程的兴修,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南北大运河、浙东运河的开凿,则进一步加强了浙北、浙东与北方政治经济中心的联系,促进了手工业、商业及贸易的繁荣。因此,杭嘉湖、宁绍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相较浙江其他地区来说,犹为快速。史称:“自晋氏渡江,三吴(会稽、吴兴、吴郡,指今太湖流域及浙东等地)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亩,膏腴上地,亩值一金”,^{[5]888}“虽凶荒之余,犹为殷富”。^{[6]181}

北宋建立后,统治者“重文抑武”,采取事权与官职分离的政策,即大量增加新的机构或副职,以分散权臣的权力。官员人数大增,因激增的各级官员大多选拔于科场导致科举中榜的人数也急剧增加,庞大的官僚机构造成财政开支不断上升,加之南宋国土面积狭小,因此统治者进一步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兴修水利、奖励耕织,而浙江在南宋处于中心地位,受益最大。除了杭嘉湖和宁绍平原地区的经济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外,处在江河下游冲积平原及盆地等地的温州、台州、金华等地经济也获得迅猛的发展。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特殊的政治地位与深厚的人文积淀,南宋时期的浙江,除浙西、浙南山区及海岛外,各地的进士人数都有明显增长,进士总数居全国第一,所出状元数额达到了22名,且分布地域较广,而温州历史上所出的6名进士科状元皆出在南宋时期。

明初始,浙江东南部沿海就遭到倭寇的侵扰。自洪武二年(1369)至成化二年(1466)约100年间,倭寇侵扰浙江凡34次,平均3年1次。自嘉靖二年(1523)至万历十六年(1588)60余年中,侵扰浙江共66次,平均每年1次,^{[7]158}倭寇攻城陷所,烧杀劫掠,危害甚重,加上明清时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极大地影响了浙江沿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前述浙江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则主要发生于浙北杭嘉湖和浙东的宁绍平原地区。如丝织业、海盐在明天启年间已是“桑柘遍野,无人不习蚕矣”,杭州府城东北的笕桥原名为“茧桥”,是蚕桑丝茧的生产中心,故以茧名。到18世纪晚期,杭州有织机3000部,宁波850部,绍兴1600部,湖州

4000部,^{[8]113}因此区域性社会经济结构出现的显著变化也主要发生在这些地区。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情形相仿,明清时期浙江籍状元的分布也非常不均衡,明代浙江共出状元21名,其中有18名出自杭、嘉、湖、宁、绍地区,而清代浙江的20名状元则全部出在上述五地。

四、浙江籍状元分布的文化教育背景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该地区的教育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教育是人才产生的前提,特别对一个地区的群体性人才而言更是如此。浙江古代状元分布的时空规律,除了区域经济环境的作用外,与其文化教育背景也息息相关。

科举制的确立是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学说制度化。从唐代开始,选士成为古代学校教育最突出的特点和目的,唐代开始的各代正史,无一例外地将学校教育制度放在《选举志》中叙述即是明证。唐代全国共有书院40余所,浙江虽有设在越州的丽正书院、寿昌的青山书院和象山的蓬莱书院,但与经济发展水平一致,唐代时浙江的教育水平与中原地区相比,也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

北宋时期,统治者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加之官僚机构的膨胀导致对官员的需求激增,科举制也得到了空前发展,与之相适应,宋代的教育也空前繁荣,但各地的教育普及程度参差不齐。据统计,宋代浙江共有州县学校122所,其中北宋48所,南宋74所,在全国名列前茅。浙江各类官私学校的数额及普及度都在全国居于前列,浙江州学的普及率为100%,县学普及率超过80%。^[9]民间教育机构性质的书院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宋代浙江书院数达156所,仅次于江西的224所,而作为传播文教的媒介造纸、印刷、书刻和藏书,南宋浙江都堪称天下第一。正是由于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浙江文化教育发达,官学、私学普及度高,因此,这一时期浙江籍状元频频出现,且地区的分布也较分散。

元代时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无论官学、私学,规模及影响都大减,但浙江书院的规模及水平在全国仍名列前茅。

明清时期的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官学发达,浙江各府州县均设有学校,同时,

书院等私学机构亦呈快速增长趋势。明朝时，浙江共有书院 260 所左右，清朝时增至近 400 所，除层次较高的书院精英教育外，明清时期浙江的大众教育也十分普及。富裕人家多聘请教书先生驻家教育子弟，一般民众则多家合聘一位教师设立私塾学堂，为了满足更大的需求，由村社或宗族出资兴办的村塾、族塾，以及得到官府支持兴办的免费的义塾也不断增加。时人就学并不仅限于识文断句，而是以参加科举搏取功名为目标，学童“自六岁就傅，父兄即望以仕，十余岁子弟之聪俊者，亦唯曰余仕”，^{[10]26} 因此教育兴盛的地区往往也是举业发达的地区，依托兴盛的官、私教育，明清时期的浙江，科举地位非常显赫。

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相一致，古代浙江教育的地区差异也非常明显，以杭、绍、湖、嘉、宁等地区最为发达。湖州地区“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文艺儒述，斯之为盛”；嘉兴地区素有重文兴教的传统，乡野小民“皆知教子孙以读书为事”；绍兴自东晋始即以文化发达著称，尤其是宋室南渡后，“下至蓬户，匪不以诗书训其子，自商贾鲜不通章句，舆隶亦多识字”，明清时期，绍兴各县几乎村村有私塾，有的一村数塾，深山穷村也不例外，仅诸暨在清代创设的各类学塾就多达 700 余所。^{[11]368} 再如杭州，处在杭嘉湖平原地区的钱塘、仁和二县，不仅各级官学普及，且书院众多，影响力大，如敷文书院、诂经精舍、紫阳书院、崇文书院等；而私人藏书楼方面，仁和县有八千卷楼、知不足斋、寿松堂，钱塘县有振绮堂，清代浙江的八大私人藏书楼一半皆在此两县，还不包括江南三阁之一

的文澜阁。与此对应，明清时期，杭州地区共出状元 9 名，其中 8 名出在钱塘、仁和二县，而西部山地、丘陵地区，仅出明代商辂 1 名。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科试中若想取得佳绩，应试文章符合考官的文风也相当重要，处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杭、嘉、湖、宁、绍等地，或为国都、省会、府治，或为政经、工商、航运中心，在对文风及考官喜好的信息掌握上，五地士子自然比其他地区占有优势，其文章也更容易受到青睐。

虽然制约科举状元产生的原因很多，但一个地区状元群体的出现仍有规律可循。在对历史上浙江籍状元的时空分布特征分析后可以发现，浙江籍状元在时间上的分布特征与其经济的发展有关，而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则与区域经济和企业文化的发展不平衡有密切联系。

参考文献

- [1] 韩茂莉, 胡兆量. 中国古代状元分布的文化背景[J]. 地理学报, 53(6): 528-536.
- [2] 脱脱. 宋史: 卷三三七·范祖禹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3] 张志东. 状元春秋[J]. 书屋, 2008(11): 58-65.
- [4] 段光清. 镜湖自撰年谱[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5] 沈约. 宋书: 卷五四·传论[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 [6] 姚思廉. 陈书: 卷二五·裴忌传[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 [7] 林正秋. 浙江地方史[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 [8] 尚钺. 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M]. 北京: 三联书店, 1955.
- [9] JOHN W C. 宋代科举[M]. 台北: 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95.
- [10] 夏卫东. 清代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 社科版, 2001, 21(4): 24-28.
- [11] 余德余. 浙江文化简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Zhejiang's Number One Scholars

XIANG Shun-gui

(Travel Service Management Dept, Tourism College of Zhejiang, Hangzhou 311231, China)

Abstract: In history, the number of Zhejiang's Number One Scholars was gradually increas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ne Scholars appeared to be limited in some area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Zhejiang's Number One Scholars might be a result of the increasing economic importance of South China and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education.

Keywords: Zhejiang; Number One Scholar; distribution; background

(责任编辑 王 抒)